

施琅研究

主编 施伟青
副主编 叶昌澄



施琅墓，位于惠安县黄塘虎窟，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泉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邹雁亭 摄





康熙二年(1663),总督李率泰墮城。二十二年,靖海侯施琅重葺城窩,扩为周六百丈。1919年间被拆除,仅存北面城墙一段于1961年由厦门市定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初,市政府拨款修复城墙64米,建立碑亭以资纪念。

邹雁亭 摄



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进兵,郑氏纳款。部议以厦门重地,令施琅挂侯印,领水师驻扎于此。水师提督署在城内,康熙二十四年(1685)将军侯施琅建。上图为提督署衙门旧照。



上图：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末五代，初称泗洲院，宋称无尽岩、元废，明复建，更名普照寺，明清之交毁于兵灾。台湾平定后，施琅捐资修复，增建大悲阁，与普陀观音道场相类，改称南普陀。改革开放以来，扩建楼堂塔院，规模倍增，焕然一新。为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

邹雁亭 摄



左图：澎湖阵亡将士之灵碑。澎湖海战乃施琅复台关键之役。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福建提督、当年攻澎先锋蓝理建立此碑，以祀是役阵亡将士392员。为厦门市文物保护单位。

邹雁亭 摄



施氏宗祠，始建于明，清初迁界时毁，康熙二十六年(1687)施琅重建。1986年，施氏后人重修，现为施琅纪念馆，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上图乃宗祠后进，专祀施琅将军。
吕宪臣 摄



同安施琅纪功牌坊，康熙五十五年(1716)，同安县知事刘兴元所建，县文物保护单位。坊为石质仿木结构。正面横额刻“绩光铜柱”，北面横额刻“思永岷碑”。

叶昌澄 摄

序 言

苏双碧

《施琅研究》文集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好事。施琅是一位有功于国家和民族，而又有较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争议双方大多旗帜鲜明，“汉奸”和“英雄”各执一端，焦点是降清背明。但对其一生中光辉的业绩——统一台湾，却不是争议的焦点，这说明对施琅的非议主要是从道德标准考虑，而不是从他的业绩考虑。但道德标准往往是因袭旧时代的标准，即诸如把“愚忠”于皇帝、忠臣不事二主等等，看成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加上清取代明，是满族人当皇帝取代了汉族人当皇帝，而且，满洲贵族在入关初期，确曾有过“雉发”和“圈地”等民族压迫现象。于是这又存在一种汉人反对满族民族压迫的民族情绪，而这种民族情绪又容易被推而广之，即把清初所有的抗清斗争，都认为是民族情绪使然。其实，“愚忠”和民族情绪有时是很难分别清楚的。明末抗清将领，大多来自旧王朝，恐怕“愚忠”于旧明皇帝的感情更多些。“忠君”作为封建道德的核心，是许多志士仁人所具备的，我们可以不必去指责他们的“愚忠”，但我们也不应把这些人笼统地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民族英雄加以颂扬。如果把历史退回一个朝代的明初，朱元璋本是汉人，从元王朝的蒙古人手中接过政权，但明初许多汉族士大夫并不事明，坚决和朱元璋作对，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誓不作官，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拒绝和朱元璋合作。这些人可以在元朝统治下读书、生活，甚至当官，却坚决拒绝和汉人出身的朱元璋合作，这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愚忠”旧君的思想，又怎么能说明这种在相异民族当皇

F572/28

帝改朝换代时出现的这些举动是什么样的民族情绪呢？在这里，“愚忠”明显地超过了所谓的民族情绪。正因为如此，用“愚忠”的道德标准来评价施琅，施琅再有多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受到肯定。

然而，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来评价施琅，首先是把满族看成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把清王朝看成是中国一重要的王朝，那么，在明王朝十分腐败，清王朝崛起之时，施琅背明事清，当不应受到指责，关键是施琅降清后的行为，是充当统治者鹰犬，欺压百姓，还是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显然，施琅统一台湾，是为统一的中国建功立业，是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建功立业，他的举动，就应当受到肯定和赞扬。至于施琅统一台湾促进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国防的巩固和领土的完整，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当不应有太多的争议。

不过，从收入这个论集的文章看，对施琅事清背明，已经不是争论的焦点，不少文章是研究施琅统一台湾和在台建立府治后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施琅和其他将领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趋势，说明施琅研究已经逐步深入，旧历史观的偏见，正在得到逐步纠正，这是可喜的现象。

在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评价中，对施琅的评价是比较有成效的。施琅这个历史人物基本被肯定，并得到史学界许多人的认同，这应当归功于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涉及到如同施琅一类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旧历史观往往遭到“忠君”和大汉族主义的困扰，跳不出旧历史学的窠臼，加上不加分析地套用气节观，而把历史人物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放到次要的地位上，使许多历史人物的功过冠履倒置。十年动乱后，“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史学界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学术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的，争鸣者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有效手段，在争论中，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应当受到尊重。当然，如果较好地做到如下三个方面，“百家争鸣”就能比较健康地开展，许多被颠倒的历史就能得到纠正。这三个问题是：一、学术问题

的“百家争鸣”可以不受世俗观点的束缚，甚至可以去考虑世俗的观点，根据史料阐明自己的见解。二、学术讨论人人平等，不受权力支配。不管哪一级领导，凡参加学术争鸣者，都是“百家”当中的一家。人人服从真理，而不服从职务和权力。三、尊重权威，但不盲从权威。学术权威是指学者对某一学术见解有独到之处，为学术界多数人所信服，但他不等于对其他学术问题都拥有权威。况且，即使权威的观点，后人也照样可以提出异议或争论。做到这三点，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只要认真展开讨论，就会引向深入，就会有成效。

清初这段历史，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交叉，比较复杂。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代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力量互相角逐。李自成在推翻腐朽的明王朝中建立了功勋，但最终被逐出中华大地的政治舞台。郑成功抗清复明，历史并没有赋予他新的内容。他的业绩是他跳出了抗清复明的框框，东征复台，终成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而多尔衮所代表的清王朝势力则成了唯一能统一中国的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凡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都属于应当肯定的力量。施琅在清统一中国的历程中，作过重要贡献，应当给以积极的历史评价和一定的历史地位。

《施琅研究》文集的主编先生，要我就该书出版时写几句话，我遵嘱而为，写了上面几点想法，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1998年10月5日于北京沙滩

目 录

序言·····	苏双碧(1)
施琅述评·····	施伟青(1)
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	
——为纪念施琅逝世 300 周年而写·····	苏双碧(20)
施琅与台湾·····	(台湾)汪荣祖(29)
台湾回归话施琅·····	陈明光(45)
南天铜柱施琅·····	许在全(53)
论施琅的历史功绩·····	黄志中(58)
评施琅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历史作用·····	杨亲华(70)
论施琅平定台湾的功绩·····	郑以灵(79)
千秋功罪话施琅·····	沈 芦(90)
“气节”问题与施琅的评价·····	苏双碧(97)
1683 年清政府统一台湾·····	陈碧笙(101)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	孔 立(117)
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若干问题·····	施伟青(133)
略论施琅平台的历史时机·····	陈 洋(141)
论施琅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决策·····	陈在正(152)
清朝收复台湾策略述论·····	王兴亚(159)
施琅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决策·····	胡沧泽(169)
从统一台湾看施琅的军事才能·····	林其泉 吴国安(181)

施琅进军澎湖几个问题的考订·····	施伟青(198)
1683年清军是“攻入”还是“进入”台湾·····	余建国(205)
施琅对统一台湾及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贡献·····	彭云鹤(208)
施琅在清初对台湾的经营和治理·····	李祖基(225)
施琅与清初开海设关通洋·····	连心豪(232)
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	孔立(246)
对立和统一	
——评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	王宏志(261)
论郑成功与施琅的恩怨·····	施伟青(271)
施琅——郑成功伟大事业的继承人·····	唐文基(291)
关于郑成功和施琅的评价·····	王铎全(304)
关于施琅的叛郑投清·····	汪敏芬(312)
施琅投清简析·····	林其泉(323)
康熙帝用施琅·····	陈金陵(332)
清初名臣荐施琅探析·····	王政尧(341)
姚启圣和施琅·····	商鸿逵(352)
论施琅与姚启圣·····	徐晓望(356)
李光地与施琅	
——兼论李光地在统一台湾中的贡献·····	
·····	李宇思 施宣圆(366)
李光地、施琅、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	邓孔昭(373)
施琅与万正色·····	陈支平 林枫(390)
施琅—蓝鼎元筹台思想的传承·····	郭志超(397)
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	
——兼论施琅与英国人的关系·····	杨彦杰(403)
施琅“挈棺入京,行献俘礼”质疑	
——郑成功墓真伪附考·····	潘文贵 聂德宁(413)
《施琅年谱考略》序言·····	苏双碧(423)

《水师提督施琅将军史迹》后记·····	(日本)施玉森(426)
施琅在闽史迹调查·····	吴永胜(432)
施琅在厦门的文物史迹·····	叶昌澄(444)
提督衙的变迁·····	龚 洁(449)
施琅在台今存史迹·····	(台湾)卓克华(454)

施琅述评

施伟青

明末清初,在国内政权鼎革、国外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之际,中国东南沿海烽火不断,狼烟迭起。在此期间涌现出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施琅,他为靖海宁疆、统一江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天启元年(1621)二月十五日傍晚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南浔乡(今衙口村),康熙三十五年(1696)三月二十一日清晨逝世于厦门任上。

施琅祖父施一举,字际名,号玉溪;父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他们都以热情淳朴、乐于助人而闻名于乡里。施琅有三个兄弟,其兄施肇科,字枢侯,早卒;弟施显,字安侯。顺治六年(1649),施显加入郑成功抗清队伍,八年,被郑成功所杀(详后)。施琅有八个儿子,长子世泽,原名世骞,字文御,号烈斋。他在“三藩”叛乱期间被郑经挟持。郑经为牵制时任内大臣的施琅,使清廷对他产生疑忌而不复用其为将以对付郑氏,遂强迫世泽在郑军中担任官职。而世泽也了解郑经的用心,为表明心迹,康熙十九年(1680),他联络志同道合者,暗通清福建总督姚启圣,谋擒郑经献厦门,旋因事情败露而被杀。这就表明他是假心事郑真心事清的。郑经的反间计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施琅复出有望。次子世纶,字文贤,号浔江。历任扬州和江宁等地知府,湖南、江南和安徽等省布政使,顺天府尹,户部侍郎,漕运总督等职。为官清廉刚直,精于办案,百姓誉其为“青天”^①。第三子世骝,字文昂,号致斋。荫授员外郎,早卒。第四子世

骥，字文中，号清峰。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施琅征澎湖，后历官至广东廉州知府。世骥为官公正爱民，康熙帝曾赐其“公明正直”四字^②。第五子世喙，字文迺，号平园，善诗文，从施琅征澎湖。康熙帝从施琅遗疏所请，命其留闽主祀宗桃。第六子世骠，字文秉，号怡园。从施琅征澎湖，后历官广东提督、福建水师提督等职。世骠虽为武将，却“和易谦雅”，礼敬士人。康熙帝曾赐其御书“彰信敦礼”榜^③。第七子世骅，字文健，号□园，从施琅征澎湖，后历官江南镇江府同知等职。第八子世范，字文尧，号希园。施琅逝世后，由他承袭靖海侯爵位。

孩提时代的施琅就已长得颐广额宽，施大宣十分高兴，认为是贵人天相，把他送进“童子塾”读书，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上“公侯将相”^④。数年后因家境衰落，施琅遂弃文习武。他不仅学习“战阵击刺诸技”，而且钻研“兵法”。时人称他“年未及冠”已是“智勇为万人敌”^⑤了。同时，他还为家庭生计而奔忙，虽年纪尚小，却已开始从事砍柴、挑盐等各种繁重的劳动。少年时代的经历，对施琅一生影响颇大，它既为施琅日后投军事戎、施展抱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使施琅较早地了解到民间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且有亲身体验。而这些对其思想品格的形成，显然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施琅早年曾先后追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成为郑军的重要将领。在清军渡江南下之时，他曾经作为郑军部将率兵往江西抗清。顺治八年(1651)，由于施琅与郑成功在战略方针、筹措军饷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郑成功拘捕施琅及其眷属。不久施琅得到部分郑军将士的帮助，逃离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潜渡安平(今晋江市安海镇)，要求其族叔施福、郑成功叔郑芝豹出面进行周旋，以期恢复与郑成功之间原有的关系。但是，郑成功拒绝和解，还派其帐下部将吴丰密往安平刺杀施琅。因施琅事先已悉情报，做好防备，吴丰行刺遭到失败。郑成功在盛怒之下，杀害了施琅父大宣、弟施显，酿成施、郑之间不共戴天的深仇

大恨。施琅终于被迫归清,与郑成功分道扬镳。

在清军中施琅历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奉命专征台湾,于六月乘南风进攻澎湖。他剿抚并用,寓抚于剿,经血战夺取澎湖后,抓住台湾郑军官兵已无斗志的有利时机,迫使郑氏集团率众降清。郑氏就抚的捷报送达京城,恰逢中秋之夜,康熙帝欣喜万分,遂赐施琅以诗:“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上将能宣力,奇功本伐谋。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⑧随后,他加授施琅靖海将军,封其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不久,他采纳了施琅保留台湾的主张,把台湾纳入清朝的版图,实现了海峡两岸的统一。此后,施琅就统一台湾后的各项善后事宜,先后具疏上陈:力主就近安置投诚人员于闽省,反对把其迁往外省,以避免移徙之苦累;奏请减轻台民的赋税负担,以苏民生;建议从投诚人员中选任将弁,以广收人才,安抚反侧。

施琅晚年十余年间,继续担任福建水师提督,驻扎厦门。他一边采取措施肃清郑氏残余势力,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东南沿海的安定局面;一边致力于“通商训农”^⑨,恢复和繁荣社会经济。同时,他还关心地方建设,热心于公益事业,并尽其所能,身体力行。清廷之所以命施琅驻镇厦门,是因为该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施琅遂疏请扩建厦门城池。岛上五老峰下,原有一座普照寺,由于年代久远,又遭兵燹而毁圮,施琅捐资修建,改名曰“南普陀”。岛上原有一座天妃宫,时亦已颓塌,施琅也捐资修葺。在泉州,他兴建府学、文庙,兴修水利,建造桥梁。诸如马平桥、安平桥和顺济桥等旧桥,施琅也捐资维修^⑩。每逢福建发生饥荒,他即告余外省,以赈济灾民。其善举义行,可谓多矣。

康熙二十七年(1688)和三十二年(1693),施琅先后两次上京朝见,都以年老乞休。康熙帝则两度挽留其镇守福建海疆。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初,施琅巡行厦门城郊,偶感风寒,遂不起。三月二十日,他口授遗疏,感谢康熙帝的眷顾之恩,恳请允准其安葬于

故里；向康熙帝荐举人材，建议加以提拔任用，以期四境永靖，百姓安居乐业。翌日清晨，施琅逝世。“卒之日，闽中绅士、居民皆巷哭，群立祠，岁时祀之”^⑧。康熙帝收到遗疏，为失去一位忠心耿耿的勋臣而“軫悼”不已，他“悉准来章，赠恤从优，谥曰襄壮”^⑨。次年十月十一日，施琅与该年先后去世的夫人王氏、黄氏合葬于惠安县的鹤顶山。三十七年（1698）八月十二日，康熙帝颁下《敕建碑文》^⑩，九月中旬，又遣福建分守兴泉道、布政使司参议王之麟连续三次谕祭施琅。赞扬他“忠勇性成，韬铃夙裕”、“果毅有谋，沉雄善断”；“扫数十年不庭之巨寇，扩数千里未辟之遐封”；“控大洋而膺节钺”，“开炎徼以作屏垣”^⑪。雍正十年（1732），将施琅入祀贤良祠。

那么，今天我们应如何对施琅作出历史评价呢？这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或者源于所见的史实不同，或是由于史学观点各异，而后者则是主要的。下面就这个问题略作探讨。

众所周知，分析任何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前已述及，施琅是于顺治八年（1651）与郑成功分手并归顺清朝的。其时国内形势已迥异于清兵刚刚入关之时：农民起义军的主力已遭到失败；先后建立的几个南明政权也已被摧毁；全国规模的抗清浪潮已被平息下去，仅有局促于西南一隅的南明永历政权和活动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斗争。换言之，从清兵入关以来，曾为争夺全国统治权而进行角逐的三股政治势力（农民起义军、南明政权和满洲贵族势力）之间的胜负已经分晓，清朝实现其在全国的统治已成定局，彻底打败西南和东南的抗清武装，已经不存在太大的困难了。

那么，由清朝取代明朝的统治，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是否历史的进步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必须承认，16世纪后期，明政权已是腐败透顶，自身又不具备调节能力，其覆灭是势所必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进入京城，就失去往日的朝气，纪律败坏，缺乏远

见,内部矛盾加剧,且与张献忠的农民军各树一帜,未能联合作战。农民军主力失败后,其余部虽能和南明永历政权联合起来,共同抗清,但其时毕竟已是势微力弱。何况永历小朝廷内部仍是矛盾重重,同室操戈,何能挡住清兵的铁蹄?可以想见,即使由它去统一全国,也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励精图治的中央政权。而新兴的清朝却生气勃勃,前期相继即位的几个皇帝都颇具才能,较有作为。所以它的入主中原,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康、雍、乾时期的历史实际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还须指出,明清交替之际,国际形势也已异于往昔。当时西方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殖民者纷纷东来,它们把侵略魔爪伸向古老的中国,攻占澳门,侵入澎湖,占据台湾,侵扰大陆东南沿海。它们的坚船利炮,已对中国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沙俄也侵入我国东北的乌龙江流域,并对东北广阔的土地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在外国侵略势力叩关犯境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权,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的安全、独立和尊严。而清朝的建立,无疑在客观上恰恰符合这个需要。因而一般说来,在三股政治势力几经较量,满洲贵族取得全国统治权的大局已定之后,凡是参预或帮助清政权结束国内战争、重建中央政权、统一和巩固疆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人,都是对中华民族有所贡献的,而不应当由于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就据之作出不同的评价。这也就是我们研究施琅的立足点,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不可能对施琅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当然,不必讳言,清朝的统一是通过实施包含武力征服在内的多种手段而实现的,其间它还推行了雉发、圈地和逃人法等民族压迫政策。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遭到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抗清斗争也是无可非议的。须知在剥削阶级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有时前进一步,就需要各族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明、清鼎革之际,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是在血与火的痛苦冲突中,推动

中国历史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所牺牲,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就否定抗清斗争;反之,也不能因为肯定抗清斗争,而否定清的统一。这是分析和评价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时,必须注意的观点问题,既不能因扬施而抑郑,也不能因褒郑而贬施。在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时,那种是此必非彼或厚彼必薄此的观点,是无法正确阐明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因而是不足取的。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以上的史学观点早已被许多学者经常地运用于研究其他历史时期的人物。例如,史学界往往既称赞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雄才大略,又颂扬屈原热爱楚国的思想情怀;既肯定曹操的用兵江南,又不否定孙权和刘备的联合抗曹。然而,这个观点一旦运用于评价参预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的历史人物时,就不免会遇到困难。就以施琅的评价为例,一些论者因施琅参预清政府的统一战争,并为其宁海靖疆作出了贡献,而斥责他是“国家的罪人”。之所以会作出如此显失公允的评价,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以封建的民族偏见看待明清政权的更替并进而评价施琅。他们把满族排斥于中华民族之外,不承认入主中原的清政权代表了中国政府。甚至有一些人把清兵入关与近代史上外国列强的入侵相提并论,视为同一性质,无怪乎他们要斥施琅为“汉奸”了。但是,这是一种既违背历史实际,又不利于今日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试问,这难道就不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吗?恐怕谁也不会说生活于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众多少数民族同胞,都是在一个早晨突然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成员吧!那么,有何根据把早在入关前就和中原地区存在着悠久、广泛的密切关系的满族,视为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异邦呢?在封建社会里,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偏见的支配和制约,在明清之际纷纭复杂的民族斗争中,事清的汉人之所以遭到贬斥,显然是